

郑和督师十万从桃花渡出使日本说探讨

——评程万军《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

施存龙

(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8)

摘要:文章对《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一文中的部分论述提出了质疑,通过查证明确阐述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对日本交往的过程以及关于海禁的政策,并从多个角度分析得出“郑和督师十万东渡出使日本论”是有违史实的结论,以供广大学者参考。

关键词:郑和;出使日本;海禁;违背史实

中图分类号:K248.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891(2016)04-0061-04

0 引言

2014年11月20日,光明网转发了《南京日报》刊载的题为《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的文章,文章作者为程万军(以下简称“程文”)。^[1]“程文”提出:“‘郑和下东洋’的故事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于‘下西洋’发生了。永乐二年,即1404年,郑和督师十万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出使日本。”以及“郑和带着20多个倭寇首级和足利义满‘臣服表’回国交差,朱棣找回了超越老爹的面子,满心欢喜,对日本国‘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又向源道义赠送了金银、瓷器、书画等物,并允许日本国朝贡团人员总数可多至二百人,在江浙贸易。此举促使当时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是郑和出使日本的成果”。笔者认为该文的观点恐违史实,不敢认同,特将自身的观点提出,以抛砖引玉,意在倡导学术争鸣之风,以还原历史真相。

1 朱元璋与朱棣父子对日本交往和海禁说法恐违史实

“程文”称:“明朝建立前后,倭寇猖獗,边患频仍。明太祖朱元璋一怒之下,断绝中日交往,实行海禁。朱棣夺得帝位后,希望四海宾服,便试着开放海禁。岂料这样一来却让日本浪人钻了空子,如潮水般涌来。倭寇势力渐大,越闹越凶,甚至有时候明朝官军都不能敌。”

但笔者认为史实并非如此。明初,朱元璋虽然对倭寇猖獗的活动很生气,但也并非因此与日断交,而是耐心地与日本政府进行外交交涉。朱元璋在即位当年的十一月就派出使者到日本诏示,在日本九州的征西将军宫怀良断然拒绝接待的情况下,他并未采取任何报复,而是于第二年又派出外交使团杨载等七人再赴日本,责备倭寇侵扰。但日本宫怀良亲王竟蛮不讲理地杀死了明朝皇帝派去的使者5人,并把使团团团长杨载关押了三个月才放还。受到如此严重侮辱与伤害,朱元璋也没有“一怒之下”断交,而是第三次派出以赵伋为首的外交使团赴日,并送还明朝捕获的日本海盗和僧侣15人,宫怀良亲王这次仍然要杀中国使者,经赵伋义正词严地声明后才罢休,然后派了个日本僧人到南京,并送返倭寇从明州(即今天的宁波)、台州掠走的居民70多人。朱元璋第四次也派中国僧人作代表往日本。^[2]

至于与日断交的缘由,可以整理表述如下。根据《明史》记载,明初左丞相胡惟庸阴谋篡国,想借助日本兵力支援。他假奏宁波卫指挥林贤有罪,并把他贬到日本,令他与日本君臣沟通,然后又复林贤的职位,遣使召还,同时暗中致信日本国王借兵。林贤回国时,日本国王派遣如瑶率兵四百名,诈称入贡献巨烛,内藏火药刀剑。但如瑶到达时,胡阴谋已败露,不能施计。几年后,日本藏兵助篡事露,朱元璋大怒,这才因此与日断

收稿日期:2016-10-11

作者简介:施存龙(1928—),男,浙江宁波人,原交通部水运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全国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

交,而并非如“程文”中所言。

关于朱元璋实行海禁的原因,笔者也有不同观点。由于与朱元璋争夺统治权的国内政敌张士诚、方国珍所部原先活动在江浙沿海一带,并还建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海军,在斗争失利后,他们逃亡海上,继续与朱元璋作对。朱元璋怕陆上的人与海上敌对势力勾结一起反对他的新政权,所以实行海禁。至于中国对海外国间的朝贡贸易的启闭,则视对方是否诚信。由于日本叛服不常,虑其欺诈,朝廷在期限、规模上加以限制。对非官方的民间海外贸易,则一律严禁。朱棣上台后并未像“程文”所说实行“试着开放海禁”。相反,朱棣上台半个月就重申海禁:“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洪武是他父亲年号,“遵洪武事例禁治”就是命令各地官府按他父亲规定的禁令,法办那些敢于私自出海贸易的人以罪。朱棣厉行海禁不但用法律手段,也用技术措施。如永乐二年规定:“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所防其出入。”航海用船,一般都是尖艏船,以便劈浪、提速,改为平头就不适于航行在海洋,只能在风较平静的内河、湖泊或海滨,这正是海禁严格的象征。海禁其实就是政府禁止中外私人之间的海外贸易,既不许中国商船私自出海,也不许外国私人商船来中国贸易。禁的是人民和走私军人,当然不会禁朝廷自己。朱棣到死也没有“试着”解除过对自己人民海禁,一切中外物资交换必须通过政府之间进行,即外国以朝贡、中国以赏赉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下,官方管理机构就是成立的浙江、福建、广东几处市舶司。当然,有的外国商人冒充该国官方来朝贡,口岸官员并不严查,让他们出售商品,自己也可捞点好处。

倭寇的继续出现,并不是因海禁松弛而导致的。倭寇存在原因很复杂,有日本内部原因,也有中国自己因素。“程文”声称:“必须指出的是,明朝所谓‘倭寇’……不是政府正规军,而是日本政府也管不了的海匪。”此话并不确切,倭寇确实不是“政府正规军”,但政府还是管得了的。如前所示,经朱元璋遣使交涉,日本征西将军府把倭寇掳掠中国明州、台州的70人送还,就是日本政府可以掌控的明证。问题在于日本政府对倭寇采取放纵态度,当他们想从明朝获得高利益时,才抓捕一些侵犯中国的倭寇送来作为求利的筹码,或是在明朝给了他们政府以外交压力和利益后,才配合中国抵抗倭寇。“程文”的说法在论证逻辑上,制造一个不存在之因,结出一个无端之果,至少在客观上是帮当时的日本政府推卸责任。

2 所谓“郑和东渡出使日本论”应是以讹传讹

“程文”中对于此论未列出任何根据,笔者起初以为是报纸摘录时省略了,放心不下,乃专程到国家图书馆找到该文出处的书,即通俗政论书《谁主东洋》。该书对“郑和督师十万使日本”这一说法也并未注明出处和理由,无法令人信服,具体探讨如下。

第一,该书提出:郑和下日本的目的之一是寻找被篡位而失踪的建文帝。《谁主东洋》说:“郑和下东洋的主要使命是什么?当然也不排除上述(下西洋)五个目的,尤其是寻找建文帝这一项秘密使命不能排除。因为按照地理方位,建文帝如果流亡海外,应该先到东洋,再到西洋。向东洋首站当属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3]但是,建文帝上台后开始与日本解冻,但当时尚未来得及建立较好关系,怎么会把逃亡和寄希望再起之地选择在毫无把握的日本?逃亡地的选择,主要决定于目的地能否安全窝藏自己,生活是否适应,对将来是否有希望,而不是决定于地理方位与距离远近。另外,学术界对明建文帝的下落有各种各样传闻,却不曾见有支持逃亡日本之说,倒有否认去日本之论。^[4]

第二,该文所谓郑和带了十万兵使日,却未举出任何文献证据。连文中引以为据的《明书·戎马记》也未说“郑和督师十万出使日本”。笔者查阅了当时朝廷记录永乐朝政事的《明成祖实录》和《明太宗实录》,并翻看了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费信等人著作及后世《郑和家谱》等,都未有郑和督师十万下日本的蛛丝马迹。如果真有永乐帝任命郑和率十万远征军赴日之事,《明成祖实录》等文献应对此等重要事件有所反映。

从永乐二年所谓郑和使日本之年算起,到《筹海图编》写成定稿的150多年间,未见有明代史料提到郑和带兵使日之事。比《筹海图编》稍前约六年问世的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上《日本》说:“靖难后,太监郑和率舟师三万下西洋,日本遣人来贡,并擒献犯边贼二十余人。即付使人治之,缚置甑中蒸死。”也还没有说有郑和使日。直到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定稿的《筹海图编》中才首次出现所谓郑和使日之事,但既未说出距发生事件150多年的后人忽然发现此事的根据,又把事情说得如此混乱不堪,所以并不可信。

第三,从事理分析,无必要和可能。永乐帝朱棣对臣下说过自己只想和平生息,不想对外国随使用兵:

“朕今休息天下,唯望时和岁丰,百姓安宁。至于外夷,思有以备之,必不肯自我扰之,以疲生民。”这些话并非朱棣口头上说说的漂亮话,在对外政策上基本是执行了的,尤其是对日本非常优厚忍让。朱棣夺取政权后,要极力证明自己是父皇(朱元璋)的合理继承人。既然父皇祖训定日本为不征之国,他怎会轻易去做对己政治不利的事,贸然派出十万大军去远征日本呢?永乐二年确有倭寇侵犯浙省的穿山,直隶省的苏、松,牺牲了一名千户,但比起以往倭寇侵掠,还不算特别严重,用不着因此派十万大军讨伐。另外,这时朱棣刚上台才几个月,立足未稳,诸事纷乱,不可能立即组成十万水军。永乐二年,郑和正忙着接受新任命,即当宫中四品太监。永乐三年,郑和正在忙下西洋事,并无分身术。所以,郑和率十万大军使日的说法缺乏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四,古籍源头存在问题,必须清本溯源。《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或《谁主东洋》作者虽未说明领兵十万赴日的立论史源,笔者已查明其出于《筹海图编》,具体内容为:“(永乐)二年,贼掠浙江穿山,而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暨王景弘、侯献等,率师二万八千有奇,海船二百八艘,赍敕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其渠魁以献。又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舡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犯边倭贼二十余人。即命治以彼国之法,尽蒸杀之。今铜甌犹存,炉灶遗址在芦头堰。降敕褒奖,给勘合百道,定以十年一贡,船止二只,人止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又遣通政使赵君(居)任赐其国玉冠服、文绮、金银、古器、书画”。当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汪向荣、夏应元合编的资料书中引述了这一版本这段话,并有一评注:“《筹海图编》所纪有误。日本的‘首先纳款’和郑和无涉,且是永乐元年的事。而擒献犯边贼二十余人是永乐三年十一月的事,而此处均系于永乐二年。”^[5]这一评注虽然正确,但还不够周到和透彻。笔者核对了2007年中华书局新出版的有今人校注本《筹海图编》。在中华书局校注本中,在“又”字前后文字,并不紧排在一起,而是分别在两处。“又”字前的一段文字处在该书第401页的《直隶倭变记》中,而后的一段文字则处于校注版的第171页,即古书卷二上《倭国朝贡事略》中,且多出一句“成祖文皇帝永乐二年,入贡。”而没有“又”字。两段并起来的其余内容与一段连在一起的版本相同。

就连在一起的版本而言,所引古籍不难看出有横加添入的破绽。前头一段明明说郑和等三人率二万八千兵去了日本,向源道义传达永乐帝意旨。紧接一个“又”字后,插进永乐帝命郑和统督十万水军谕诸番。此种表述于理不通。同在永乐二年的一年内,既已派郑和率2.8万水军去了日本,怎么又能派郑和率水军十万谕诸番呢?而且结果都是一样的,即献20余名倭寇。何况,永乐二年,郑和何曾有谕诸番之事?下西洋是在永乐三年六月下诏,冬天才起航。尚未发生的事,怎么能在其一年前就生效了呢?两种版本的共同错误是郑、王、侯三名太监一起率兵使日本,王景弘并未曾出使日本,侯献即侯显出差在西藏,不可能在此时同郑和一起率兵赴日本。

3 今人不该轻信古籍并加码

古人的错误,今人上当受骗弄,不该嫁罪于今人,但今人也有该自己负责的部分。《筹海图编》总体看是一部重要而又很好的书,但两派后人各为祖先争光而插手过。在这过程中,有意无意中窜入伪作或误句是难免的。《筹海图编·倭奴朝贡事略》虽然错误地写进了郑和领兵十万,但也还未说他带了十万兵去日本,而是说他去“诏谕海外诸番”,而“诸番”重点应指下西洋所谕的西洋各国。要强词夺理,也可说包括日本,但决无道理把“诸番”当作日本一番。退一步而论,若郑和真的奉命督师十万赴日,师出有名吗?当时日本执政者已是主动向明朝示好的源道义,他在所谓郑和使日的前一年,即永乐元年,就遣使圭密等率三百人,奉表献马及铠冑、佩刀、玛瑙、水晶、硫黄诸物。明朝回赐圭密文绮、绢绢衣,并钱钞、纁丝、纱罗有差,赐其通事冠带,命礼部宴之。仍命遣使(按:当指赵居任)同圭往。赐日本王冠服、锦绮、纱罗,及龟纽命印。永乐二年日本两次来使表示友好。第一次,源道义遣使梵亮奉表,贡马及方物,谢赐冠服、印章。(永乐帝)命礼部赐钱钞、彩币,及宴饗其使。第二次,源道义遣使永俊奉表,册贺立皇太子,并献方物。命礼部赐钱钞、彩币及宴饗永俊等。

在这种情况下,朱棣不可能派大兵去日本。至于当年四月,发生了倭寇劫掠直隶和浙江,完全可以通告日本来使,回去请日本国王立即管束其人民勿得再来中国作寇,已作寇的应加惩办。随伴日使回国的明使,也会向源道义宣谕永乐帝意旨。如其不理,再施加压力也不迟。事实上,郑和并没有去,第二年即永乐三年,源道义就按明朝要求,遣使源通贤等奉表,贡马及方物,并献所获倭寇尝为边害者。日本学者著作也反映郑和没有去日本。

此外,“程文”说:“据《明史·戎马志》记载,郑和下东洋只做了两件事。一件,晓谕明成祖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二件,‘许以贸易。’双方签订《勘合贸易条约》……日本人在条约规定下,持诏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中国的丝绸、瓷器、书画、资财等等,尽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而非‘野蛮打劫’地拿走。”按《明史》并无《戎马志》,只有明末人傅维麟的《明书》才有《戎马志》,是作者张冠李戴。所谓郑和在日本与源道义双方签订《勘合贸易条约》,不能成立。笔者曾在著作中提出:“第一,不存在勘合贸易条约这件事。勘合贸易是有的,而条约是不存在的,这是日本学人一厢情愿的提法,签订条约是近代史国际关系处理方式,当时无之。且永乐初,日本幕府将军源道义对明以“臣”相称,性质乃是“贡赐贸易”,方式则是勘合贸易。第二,郑和未曾履行缔约的中方代表签字订约,所以是臆测之说。”这段话对程先生文章仍是适用的。因为没有任何当时史料作证,而《明书》是清初的作品,且对所记内容未交代任何出处,所以本身就缺乏史料价值。

4 十万大军从桃花渡起航赴日并不可能

退一步假定,即使郑和确实率十万大军赴日,也不可能从桃花渡启航。“程文”说“郑和……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出使日本。”然而,桃花渡的位置并非在“宁波附近”,而是在宁波城市中心,是明朝宁波府治同廓的鄞县城的东门渡口,也是明代宁波城门口繁华地区。明代成化四年(1468年)出版的《宁波郡志》称:“东渡,即桃花渡。”该渡所在的甬江是一条中型河流,江面宽度在明初与现代宏观变化不大,桃花渡江面根本停泊不了大量的航海大帆船。即使多批排队登船,让已装兵员的船分别停泊沿江各处岸边,也会拥挤不堪。宁波在汉代称为句章港时,确曾作当海军基地,横海将军韩说率大军就曾从句章港出征。但在明初,桃花渡早已是商港,并非明代军需供应地,不可能在该处集合千艘军舰出发。明代具有军港功能的港口在长江里南京或长江口刘家港。如果是一般对日出使和接使,只有几艘规模的使船,桃花渡是适合的,因为宁波港是唐代中期以来的中日、中朝航线的传统国际开放港。所以,桃花渡作为大军出发地是不可能的。

5 结束语

笔者认为“程文”关于“郑和下东洋”的说法有违史实,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未先行外交交涉,就贸然督十万大军到日本兵临城下,这样的说法实际上破坏了郑和率舰队下西洋“和平使者”的形象。本文对“程文”的“郑和督师十万从桃花渡东渡出使日本”的评论,是笔者20多年来一贯的立场和学术主张,并无任何个人成见,如有不妥,欢迎广大学者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 [1]程万军.鲜为人知的“郑和下东洋”[EB/OL].(2014-11-20)[2014-11-20]http://culture.gmw.cn/newspaper/2014-11/20/content_102118130.htm.
- [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M].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3]程万军.谁主东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 [4]明孝陵博物馆.天下说建文—明建文帝下落争鸣集[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
- [5]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4.

Study on Leading Hundred Thousands of Army by ZHENG He Serving as an Envoy from Taohua Du to Japan

——Comments on CHENG Wan-jun's Little-known ZHENG He's Voyage to the East Ocean

SHI Cun-l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Water Transport Science, Ministry of Transport,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questions some parts from Little-known ZHENG He's Voyage to the East Ocean, expounds ZHU Yuan-zhang and ZHU Di's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and the policies about banning maritime trade as well as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ZHENG He's serving as an envoy to Japan is contrary to historical facts, which is expected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ZHENG He; Envoy to Japan; Banning maritime trade; Contrary to historical facts